

爱新觉罗·毓岳 著

我跟溥儀二十年

末代皇子回忆录

红旗出版社

我随溥仪二十年

——末代皇子回忆录

爱新觉罗·毓岳

红旗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 108 号

我随溥仪二十年

——末代皇子回忆录

编著者 爱新觉罗·毓岳

责任编辑 李凡 封面设计 范贻光

出版 红旗出版社(北京沙滩北街2号)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工商印刷厂

787×960毫米 32开4印张70千字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80068—456—3/Z·139

定价:2.90元

6172

86381



(中)溥杰(右)毓岳

前言

我姓爱新觉罗，名毓岳，1918(民国七年)出生于北京惇王府后花园，后移居天津。1936年被溥仪找到长春伪宫内廷读书。1945年随溥仪被苏军俘获入苏。1950年由苏联被遣送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7年受政府宽大处理，免诉释放回北京。1958年由当地派出所组织劳动，文革中又转到山西长治农场劳动。1979年落实政策回到北京郊区原农场，因病退休。

为了不忘记过去如何走向危害祖国人民的歧路，以及在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使我从战犯的行列里重新成为一名光荣的公民的恩情，几年前就写成了这本“回忆”。

我写的这本“回忆”，目的是想把我几十年来的坎坷经历，如实地报告给广大读者，因为我写作能力有限，写的“回忆”力求实事求是，毫无虚构，但由于记忆力差，难免没有一点差错，深盼同我接近的人和亲友们，多加指正。

毓 岳

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日

目 录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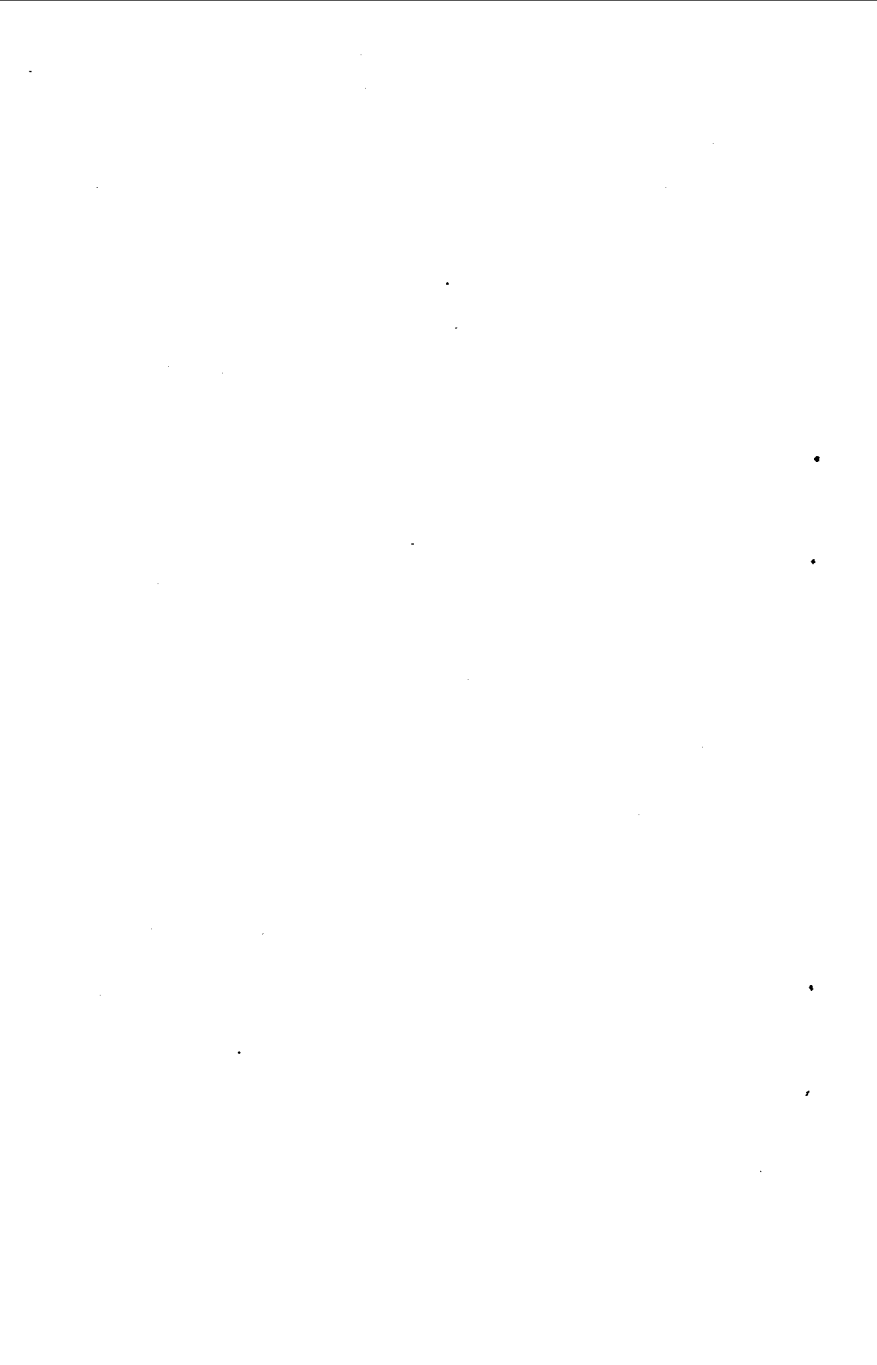
我在伪满宫内府作溥仪身边的内廷学生	(1)
我和溥仪的家族关系	(3)
在伪满内廷学生班	(4)
溥仪及其后妃、贵人	(6)
溥仪怎样对待我们	(14)
孤儿们的悲惨遭遇	(18)
溥仪和日本帝国主义	(22)
溥仪迷信神佛	(24)
空袭中的溥仪	(27)
伪满垮台前夕	(28)
我随溥仪被俘在苏联	(31)
在沈阳机场被俘	(33)
在苏联收容所	(38)
遣返回国	(51)
我随溥仪回国学习改造	(53)
参观抚顺露天煤矿	(91)
会见亲属——七祖父(载涛)、三姑母(韞颖)、 五姑母(韞馨)	(93)
一九五六年末,春节联欢晚会	(95)

DQ93/20

免于起诉,释放回家·····	(99)
我离开溥仪回到北京家中后的简况·····	(103)
在北京见面·····	(107)
溥仪回京后,我再次和他相见 ·····	(109)
我患病,溥仪来到我的陋室探望 ·····	(110)
我去政协看望溥仪时的几件事·····	(111)
溥仪和李淑贤结婚的前前后后·····	(117)
溥仪患病期间,我们去探望他 ·····	(119)
溥仪的逝世·····	(121)
参加溥仪的追悼会·····	(122)

我在伪满宫内作溥仪身边的 内廷学生

(1936 年冬—1945 年 8 月 13 日)



我和溥仪的家族关系

我姓爱新觉罗，名毓岳，是清朝宣宗成皇帝（即道光）第五子和硕惇勤亲王奕谿的曾孙，溥仪的祖父醇贤亲王奕譞是我曾祖父的七弟。这是我和溥仪的家族关系。

我的祖父载灃，是惇亲王奕谿的长子，袭封为多罗贝勒。后因庚子事变，各帝国主义侵入北京，祖父的二弟端郡王载漪因支持义和团丢爵，祖父亦被革爵在家“闭门思过”。民国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祖父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溥仪让“照贝勒例赐恤，并赏银四千元”，葬于门头沟葡萄嘴。我的父亲溥仪是我祖父的长子，曾受头品顶戴，乾清门侍卫。在我记事后，没见他有什么正式工作，只是当过很短时间的京汉铁路局职员，以后就教本家子侄儿读书。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十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

我的胞叔溥修，受清朝二品顶戴。我幼年时期，他在北京没做什么工作。到我十二三岁时，他常到溥仪当时的住所天津日租界宫岛街静园上班。一九三一年底，溥仪离开天津静园去了东北，溥修便掌管静园和溥仪在那里留下的财产。自清朝被推翻后，我家日趋没落，只剩下全家居住的惇王府（俗称朝内五爷府）的后花园。当时家中生活非常窘迫，常靠借贷

或典当维持生活。溥修在天津静园上班后，家中生活有所好转。溥修总管静园后，便把全家从北京迁到天津，住了溥仪私人楼房中的两所（日租界明石街永平里四号、五号）。我便在天津学汉文和日语。溥修把北京仅有的旧房产卖掉，得了一万多元。这样一来他真是有点忘乎所以了，经常捧唱大鼓的，或夜游烟花柳巷，最后买了一个妓女作姨太太，并在天津又租了一所楼房安置她。不久，他把卖房的一万多元挥霍光了，只好把姨太太送到长春他岳父家寄居。

在伪满内廷学生班

一九三六年冬季，溥修忽然告诉我的哥哥（毓岱）和我，说溥仪叫我们到长春伪满宫内府补习，将来再送我们到日本留学。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觉得出国留学有趣，并有好前途。于是我和哥哥在溥修的带领下，乘火车到了长春，住在姐姐（胞姐菊英）家中。过了些天，叔父便带着我和哥哥到伪满宫内府候见室，求见溥仪。等了一会儿，由内廷司房毛永惠带着我们进入内廷，到了缉熙楼溥仪的书斋，当时我心里怦怦直跳。溥仪来到书斋，坐在“宝座”（他专用的特制的椅子）上，我和哥哥便面向着他行礼，先请跪安，又叩了九个头（三跪九叩）。我没敢抬头看溥仪，等他问我话时，我连应当如何回答都忘了。本来在见溥仪之前，溥修告诉我们和溥仪说话要称他为“皇上”，自称“奴才”。可是当溥仪问我话时，我把自称

“奴才”说成“奴才我”了。没说几句我们就出来了。从此，我们便在所谓的宫内府学生班读书。

初到学生班时，班里已有先到的四名同学：溥俭（班长）、溥佐、毓岭（后改名毓塘，这三人都是我的近本家，都是惇王府的后代，我都熟识；还有一名毓慈，是我的远本家，庄王府的后代，过去没见过，他在家居住，每天到学生班上学。不久，因溥佐打伤了我哥哥毓岱，溥仪开除他二人。学生班后来又增收了恭王府的后代毓瞻、毓崔，泽公府的后代溥侯，庄王府的后代毓恩。

溥仪为什么让我们在伪满内廷学生班呢？

原来溥仪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才到东北长春当上了傀儡皇帝，他的一切行动全得听关东军的指挥。他是多么希望能设法恢复大清帝国，自己真能当上名副其实的封建皇帝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培养一批有才能又能掌握军权的心腹。这就是他先后派遣他的弟弟溥杰、内弟润麒、堂弟溥俊、本家顺承郡王文癸到日本留学，以及陆续在较近的本家子弟中选择了我们这一批人到内廷学生班来学习的原因。

我到伪满内廷学生班学习，本来估计补习一两年就能到日本去留学，谁想到年复一年过去了，到日本留学的事却再也没人提起。我们在学生班学了九年，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垮台为止。我们没能去日本留学的原因，据溥仪平时谈话透露，他以前派往日本学习的人，毕了业就

各奔前程，不再唯溥仪之命是从了。尤其是他的亲弟弟溥杰，在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和日本华族嵯峨天皇的后代嵯峨浩结了婚。伪满宪法中有关伪满皇帝继承的规定，大意是皇帝如果去世，帝位由亲子继承，皇帝如果无子，则由皇帝的弟弟之子继承。这样一来，溥仪和溥杰同胞兄弟之间便产生了矛盾。从表面看，溥仪在溥杰本人或同他妻子一起来见面时，是高高兴兴的，而心情却是很复杂的。一九四二年我姐姐在长春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双方见过面都同意了。但等我向溥仪说明时，溥仪却因女方是长春日本学校的毕业生，她的哥哥在伪满大同学院工作，而产生顾虑，大概是怕我结了婚，又和日本发生联系。所以他对我说：“你如果和她结婚，我以后就象对溥杰一样对你，什么事都不对你说。”溥仪这样说，比直接反对我那门亲事还厉害。因此，我硬着头皮对我姐姐说我不愿意，不能结婚，使我姐姐大大着了一回急。

溥仪及其后妃、贵人

我在一九三七年到长春伪满宫内府学生班学习。开始时，学生班的学生每天都在宫内府范围内的勤民楼东侧一所院落里住宿和学习。起初溥仪找我们见面或一起吃饭的次数很少。大约一九三九年前后，伪满内廷缉熙楼和宫内府范围内勤民楼的东部，新建了一幢黄色琉璃瓦顶的两层楼房，溥仪给起了

一个名字叫“同德殿”。这样一来，伪内廷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就在那个时候，溥仪命我们学生班的学生迁到同德殿北侧楼道底层的几间屋子里。这几间白磁砖围墙铺地的房子，原来是准备做伙房的。我们搬到这里，即将其中两间作书房。三间作寝室。此后，我们和溥仪见面及同桌吃饭的次数就多起来了。不久，我们便每天和溥仪见两次面，午饭晚饭都和他一起吃。除他在下午和夜间睡觉时外，我们可以到他的书斋去等候见他，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垮台为止。

溥仪在伪满内廷的日常生活，是早晨八九点钟起床，午前有时到勤民楼见人，有时就在内廷缉熙楼。这段时间我们上课，所以溥仪做什么我不清楚。中午我们和溥仪一起吃饭。吃饭地点一般是在缉熙楼溥仪寝室外面的小走廊上，偶尔也在同德殿的广间（即大房间）里，夏天吃晚饭，则有时在缉熙楼南门外庭院里。午饭后，我们去上学。晚七时前后，我们到缉熙楼书斋，等候溥仪从寝室出来一起吃晚饭。

溥仪的皇后郭布罗·婉容有鸦片烟瘾，当时她虽住在缉熙楼东半部，但溥仪却很少和她见面，每年只在春节和溥仪生日见一两次面。溥仪见她时，有几次我在旁边。她和溥仪见面时，梳装打扮倒是整齐讲究的。但平时她偶然由太监服侍从缉熙楼走过院中时，我见她头也不梳，衣服也不整齐。特别是一九四五年八月间伪满即将垮台时，溥仪为了从新京（长春）伪宫内府内廷逃往通化大栗子沟，有一天叫我们学生和随侍及“殿上的”（打扫溥仪住房的杂役）收拾

准备携带的物品和烧毁他与日寇勾结的影片。一名“殿上的”在缉熙楼地下室的锅炉房里烧影片时，引起火灾。溥仪慌忙从寝室出来，由楼上跑到院子里。当时婉容还在楼上，我急得不顾一切规定，向楼上跑去，准备救出婉容。我刚跑上一层楼梯，一个太监（名叫元儿）已背着她从楼上往下走。那次她是披散着头发，穿的大概是件睡衣，真是狼狈不堪。幸而火被消防队救灭了。几天后，婉容便和溥仪从新京宫内府内廷缉熙楼逃到通化大栗子沟，溥仪只带了我们八个人（溥杰、润麒、万嘉熙、毓塘、毓嶠、李国雄、黄子正和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溥仪又带着我们从大栗子沟乘火车到通化飞机场，换乘三架小型飞机飞往沈阳机场，准备换乘大型飞机逃往日本，在沈阳被苏军捕获转到苏联。婉容和溥仪的其它家属及随行人员留在大栗子沟，不久，又向各自的家乡投奔。婉容由于烟瘾，在半路结束了她的一生。

溥仪的淑妃文绣是和婉容同一天在北京故宫内和溥仪结婚的。她和溥仪被冯玉祥从北京故宫赶出后，跑到醇王府（后海北沿摄政王府），辗转到了天津日租界宫岛街。先住在张园，后住在静园。据说那时婉容把文绣安置在三层楼上，目的是叫她难于和溥仪相见。溥仪从天津去长春之前，文绣和溥仪离了婚。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溥仪从北京找了一名女子，是满族人，姓他他拉氏，名叫谭玉龄，溥仪封她为贵人。谭玉龄在伪满内廷西花园后院（植秀轩）念书，老

师名陈曾矩，是伪满宫内府近侍处处长陈曾寿之弟。当时我们学生班在西花园前院北房（畅春轩）读书，上下学有时遇到溥仪带着谭玉龄从缉熙楼出来到西花园散步。溥仪对谭是非常好的。谭玉龄受封为贵人后，住在缉熙楼下西半部，也就是溥仪住室的底下。在几次晚间溥仪带着谭玉龄在同德殿餐厅大房间里看电影，也叫我们学生同他们在一起看电影。在伪满宫内府内廷，溥仪延袭清朝内廷的习惯，外臣或王公子弟是不能和皇后、妃嫔、贵人们相见的。我们那时在伪内廷院内行走，偶然遇到贵人带着妈妈、太监过来，一听到妈妈、太监们喊一声“走”的声音，我们立即跑开躲避；实在跑不开时，就要面墙而立。溥仪带着谭玉龄和我们一起看电影，说明这是他对我们的一种特殊“恩遇”。

谈到谭玉龄，我又想起我祖父三弟载澜的孙子毓嵒改名的情况。那是溥仪封谭玉龄为贵人以后，忽然对我们宣布毓岭（毓嵒原名）和清朝乾隆皇帝的陵寝（坟地）裕陵同音，故改毓岭的名字为毓嵒。而谭玉龄的名字没改。当时我内心产生疑问，认为溥仪改毓岭的名字，表面是因为毓岭与裕陵同音，实际是因为毓岭和他的贵人谭玉龄的名字同音。谭玉龄在伪满宫内府内廷时期很受溥仪的宠幸，她对溥仪也非常尽心。大约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谭玉龄忽然得病。开始溥仪派他的中医大夫佟阔泉和徐思允给谭诊脉开药方。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溥仪首先叫佟、徐两大夫给开药方，然后由他自己给增减修改，再抓药给谭

煎服。溥仪这样做，是因为他粗通中医知识。而佟阔泉是北方大夫，开的药方剂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开的药方剂量特小，所以溥仪对剂量加以调整。我不懂药理，溥仪这种办法，对治疗谭玉龄的病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弊呢？实际上谭玉龄的病未见好转。当时溥仪还有一名西医大夫黄子正，黄在长春市开了个小医院，因收入少，本打算停业回台湾原籍，正巧有一年溥仪大腿内侧起了一条红线，找来一个西医给治好了，这个西医就是黄子正。为此，溥仪赏赐黄子正五千元，叫他继续开那个小医院。从此，黄子正实际上就成了溥仪的专用西医。每天傍晚到伪宫内府内廷来等候传诊。溥仪因为谭玉龄的病经中医治疗不见好，便叫黄子正给她看，谭的病还不见好。溥仪有些慌了手脚，又叫一个针灸大夫林永泉给谭针灸，真是有病乱投医了。结果，谭玉龄的病日益加重。溥仪又通过黄子正找来伪满新京市立医院的西医（日本人）给谭治疗。我们几个学生（溥俭、溥倬、毓嶠和我）也在谭玉龄居住的缉熙楼外屋给谭玉龄准备中药。那个日本医生在谭玉龄的寝室里给谭注射，又给输血。我见那个日本医生在外屋从一个带去的护士胳膊上取了血进里屋给谭输血。那天已是深夜，医生正紧张地给谭玉龄治病，忽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伪满“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是日本帝国主义指挥操纵溥仪的专人）忽然来到宫内府候见室，把那个日本医生找到候见室，谈了许久，然后那个日本医生又去内廷继续给谭治疗，看起来不象以前那么